



蜂房

〔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 著



水華



蜂 房

〔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 著

孟 继 成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蜂房》是西班牙当代第一名著，属现实主义作品。现在已被西方译成各国文字，评论家认为：要谈西班牙战后文学，第一要谈《蜂房》。

《蜂房》以一家咖啡馆为背景，描写了近160个人物，其中有小资产者、小商贩、小知识分子、小职员、失业者、女佣人、家庭妇女、孤儿、妓女、妓院老鸨、同性恋者等等。通过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这些中下层人物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及其精神状态，表现了那个时代。

《蜂房》写作上的最大特点，是在情节上突破了从始至终贯穿一条故事脉络的传统写法，而将人物全面铺开、穿插描写，实属一种新的写作风格。

蜂 房

Feng fang

〔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 著

孟 继 成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01,000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0

书 号：10326·96 定 价：1.45元

第一章

“不能没有眼力架儿，我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做买卖唯有这点最重要。”

咖啡店女主人罗莎夫人在店堂的桌子之间转来转去，她那肥大的臀部不时地碰在顾客们的身上。她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啧啧，简直乱弹琴”。对于她来说，她的咖啡店以及这咖啡店周围的一切就是整个世界。有人说，每逢春天当姑娘们开始穿起短袖衣服的时节，她的眼里就会放出慷慨的光。不过，我想这些都是瞎扯，罗莎夫人从来不曾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漏过去一块银元，当然也不管是不是在春天。罗莎夫人所喜好的，是在桌子之间拖着她那沉重的身体机械地转来转去。剩下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她便亮出仅仅九角钱一包的雪茄抽起来。她还喜欢喝茴芹甜酒，而且是大杯大杯地喝，从起床后到睡觉前一直都在喝，喝完了就咳嗽，然后又微笑。高兴的时候就坐在厨房里的小板凳上看小说或看小册子，越是血淋淋的故事越爱看，什么书都是好的。看过之后，她就给人们说笑话；要不，就给人们讲发生在博达多列斯大街或从安达卢西亚开来的直快列车上的惨案。

“纳瓦雷特的父亲跟米格尔·普里莫·里维拉将军是旧交。他去找到将军，跪在他的面前并对他说：‘我的将军，看

在上帝的面上，您就宽恕了我的儿子吧’，米格尔公呢，虽然他有金子一般善良的心，但是他回答道：‘这是不行的，我的朋友纳瓦雷特，您的儿子所犯的罪是必须判以绞刑的。’”

“都是好样的！”她想，“说这些话都需要有些胆量！”罗莎夫人长着一副满是色斑的脸，象蜥蜴那样总是在变换着颜色。当她陷入沉思之际，由于面部神经松弛而呈现出一些长条色斑，有时简直长得象节日的彩带。待她恢复常态之后，便又来来回回地转悠，并且朝着顾客们微笑，露出那排黑黝黝塞满污垢的碎牙。其实，她是打心底里憎恶这些顾客的。

莱昂纳多·梅伦德斯先生欠塞贡多·塞古拉六千杜罗①。塞贡多是个迟愚之辈，他象一个病弱的乡巴佬那样又呆又木。他辛辛苦苦地积攒了多少年的钱，却一下子都借给了莱昂纳多先生。莱昂纳多先生则把借来的钱花得个精光。他这个人是靠欺诈来生活的。他总是提出一套做生意的办法，但总是见不到任何结果。不是他的生意做得不好，而是他根本就没做，因而既谈不上好，也无所谓不好。莱昂纳多先生的胸前总是挂着耀眼的领带，而且还要在头上抹些发蜡，离着老远就能闻到那发蜡发出的香气。他有一副大老爷的架式，看样子象是无比庄重，实际上却露出一副俗人的气息。我是不相信他的生活有多富裕，但是你看他那副样子，真象是口袋里从来不缺大把大把的零花钱。他对自己的债主们并不表示尊重，反而是他们要向他示以微笑，投以尊重的目光，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打算对他进行起诉的也不乏其人，只是至今谁也没有撕破脸儿。莱昂纳多先生的口头总喜欢挂着两样儿东

①西班牙币名，相当于五个比塞塔。

西：要么是说上几个法语单词，如madame（夫人，女士）、rue（街、路）、cravate（领带）之类；要么开口便曰“我们梅伦德斯家族”如何如何。莱昂纳多先生是位斯文之士，总要表露出自己懂得很多。他手里常常玩着一对跳棋棋珠儿，平时坐在这里喝的也不外乎是加奶咖啡。他如果看到邻桌的人正在抽黄烟①，就细声细气地对他们说：“您能给我一张纸吗？我想卷一支有劲儿的，可是没带烟纸。”于是，那个人就会认真地说：“没有，我不用烟纸。您要是想抽烟，这儿有现成的……”莱昂纳多先生却要露出一种犹豫的表情，迟上几秒钟才作回答：“也好，抽支黄烟换换味儿。说实话，烟卷我并不是太喜欢。”有时候，邻桌人只是说：“不，纸可没有，让您失望了，真过意不去。”于是，莱昂纳多先生只好落得个没烟抽。

顾客们的胳臂肘撑在独腿圆桌的陈旧而且带有疤痕的大理石桌面上。女店主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他们几乎不是在看她，而是在漫无边际地思考着这个世界。哎！本来可以不是这个样子，可是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一点一点地在完蛋，而且谁也解释不出这是为什么，也许一开始是因为芝麻大的一点小事，后来却打起仗来。许多独腿圆桌的大理石桌面本来是归葬会②的墓碑。在一些桌面的背面至今还保留着刻撰的碑文，即便是一个盲人，只要他从桌子下面伸进手去用指肚摸一摸就会读出：“埃斯佩兰萨·雷东多小姐之墓。卒于芳龄妙年。”或者读出：“尊贵的拉米诺·洛佩斯·普恩特博士大人之墓。曾任经济发展部副部长。”

①黄烟比雪茄贵。

②在马德里一种负责其成员死后葬到自己的家乡去的宗教团体。

咖啡店的顾客们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相信世界上的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已然如此，没有必要对任何事情进行补救。在罗莎夫人的店里，所有的人都在吸烟，多数人都在独自思索着那些不幸而又亲切的心事，这些心事或者使他们对整个生活感到充实，或者使他们感到空虚。在一片安静之中，有的人做出困倦的姿式，那是由于回忆不起来了；有的人则呆呆地在那里一个劲地回忆，面部表情象是一头发情的雌畜那般多情、贪婪而疲倦：用手托着额头，目光充满了苦闷，如同一汪死水。

有时候在下午，间或在几个桌上有人在聊天。聊的内容无非是刚下的小猫怎么样了，或者是今天的供应如何，要么就是说起那个死去的小孩，可是听的人却记不得了。就是那个死去的孩子，不记得了吗？黄头发、长得挺俊，或者说挺瘦挺精，总是穿着一件浅咖啡的毛线衣，有五岁的光景。在这样的下午，这咖啡店就象一颗病人的心脏，失去了节奏，空气也越来越浑浊、压抑，尽管不时地扑来一股柔和的气息，既不知是从哪里来，又如闪电般在瞬间逝去，但这是一股充满希望的气息，它在几秒钟之内启开着每一个人的心扉。

总的说来，海梅·阿尔塞先生还是很有派头的，虽然人们逼着他还债。不过在这家咖啡店里并非如此，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海梅先生向一家银行借款，银行同意了，于是他签署了一个字据。后来就发生了倒霉的事。他拿着这笔款去做生意。但是他陷入了人们设好的圈套，结果分文不剩。银行拿着字据要他还债，他只好说还不起。肯定说来，海梅先生是一位好人，但他运气不佳，在钱这个玩意儿上总是倒运。说

他很勤劳，倒也不是，这可是实在话。但他一点儿也不走运。跟他一样游荡或更为清闲的人们，走上两回运就能挣来几千杜罗。这样不仅可以还清债务，还可以悠然自得地抽上上等烟，终日坐着小汽车兜风。海梅先生可没有遇到这种机会，在他身上情况截然相反。他曾做好干什么都可以的思想准备，什么机会先出现就干什么。但是从来也没出现过任何值得一干的机会。于是，他终日泡在咖啡馆，把头仰在长毛绒的椅背上，两眼望着金黄色的天花板。有时他还低声唱着一段小曲儿，脚上打着拍子。海梅先生对自己的厄运是从来不愿意想的，实际上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愿意想。他常常会眼睛望着镜子自言自语：“是谁发明的镜子呢？”接着又把目光落在随便一个人的身上，呆呆地望着人家，甚至会达到不礼貌的程度。“那个女人有小孩吗？大概她是个假正经。”“这咖啡馆里会有几个人有肺病？”海梅先生卷了一支很细的烟，是玉米叶烟，他点燃了它。“有的人是削铅笔的艺术家，他可以把铅笔削得象针那样尖而从不折断。”海梅先生换了换坐的姿式，因为他的一条腿坐麻了。“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嗵，嗵，嗵，嗵；不管春夏秋冬，日日夜夜，这颗心总是在跳。”

最里面常常坐着一位太太，一声不响，坐在通向楼上台球房的螺形梯下。她的儿子死了还不到一个月。小伙子叫帕科，是学邮电的。起初说是得了瘫痪，但后来一看又说不是，得的是脑膜炎。他很快就失去了知觉，不久便死去。噩耗传遍了各地，传到了莱昂、卡斯提亚老城、卡斯提亚新城、以及巴伦西亚的一部分（卡斯特荣和差不多半个阿利冈德）。他的死引起人们巨大的悲痛。帕科自从小时候在一个冬天受

了寒湿之后身体就一直不好。他的母亲剩下只身一人。她还有一个儿子，也就是长子，在外面混事儿，谁也不知他的下落。每逢下午，这位太太便到罗莎夫人的咖啡店来，坐到楼梯根儿上的那张桌子旁，一边取暖一边消磨时光。自从她儿子死去，罗莎夫人一直待她十分亲切。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总是在别人家出了丧事之后表现得非常殷勤。他们在这个时间劝慰事主节哀或者振作，而且他们可以把这种事情做得很好。罗莎夫人为了安慰帕科的母亲，常常这样说：与其落个傻子，倒不如让他随上帝而去。这位母亲以赞同的微笑看着她，并且对她说，当然仔细想来还是她说的对。帕科的母亲叫做伊莎贝尔，即伊莎贝尔·蒙特斯夫人，是桑斯的遗孀。这位太太至今看来还有几分姿色，穿着一件条纹的外衣，颇有大家女子的风度。在咖啡店里，人们都尊重她的文静，偶或有个熟人并且常常是个女人，在去卫生间回来路过此处时把手挂在桌子上问她：“怎么样了？孩子的魂已经升天了吧？”伊莎贝尔夫人只是微笑，几乎从来不做回答。倘遇略有兴致，便抬起头来，看着女友并且说：“你可真够漂亮的！”最常见的情景是什么也不说，告别时仅仅用手示意一下就算完事。伊莎贝尔夫人知道自己是属于另一等阶级的，起码是属于另一种人。

一位几乎开始衰老的小姐招呼那个卖火柴的人。

“帕迪亚！”

“来啦，埃尔维拉小姐！”

“一支‘人鱼牌’的。”

这小姐在兜里找了半天，兜里尽是些亲昵而不体面的旧



信，然后放在桌上三角五分钱。

“谢谢。”

“应该谢您。”

她点燃了烟，吐了一口长长的烟雾，便把目光消逝在远方。一会儿，小姐又喊道。

“帕迪亚！”

“来啦，埃尔维拉小姐！”

“你把信交给那个人了吗？”

“是的，小姐。”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说，他不在家。女仆对我说放心好了，晚饭时肯定交给他。”

埃尔维拉小姐不作声，继续抽着烟。今天她感到有些不舒服，打冷战，而且觉得看什么都发晕。埃尔维拉小姐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仔细想来，这样的生活实在没有意思。无所事事，这是真的，但是由于什么也不做，最后连饭也吃不上。她只是看小说，去咖啡店，偶尔抽上一支“人鱼牌”雪茄，然后就等着天上掉馅饼。可恨的是天上很少掉下东西来，即使掉下来，也几乎总是残羹剩饭。

何塞·罗德里格斯·德马德里先生在最近的一次抽彩时中了小彩。朋友们对他说：

“您走运了，呃？”

何塞先生的回答总是一个样，好象是从哪儿学来的：

“罢了！才八个臭杜罗。”

“别这样，伙计，不必解释，我们什么也不跟你要。”

何塞先生是一个法院的抄写员，看样子有一点小积蓄。也有人说，他曾和一个很富的女人结婚，那是一位来自曼恰的姑娘，可惜很快就死去了，于是财产全部都归了他。何塞先生很快地把四座葡萄园和两座油橄榄园卖掉，原因是他认定乡下的空气对他的呼吸道有害，他首先应该保重的是身体。

何塞先生在罗莎夫人的咖啡馆里一般是买酒喝，他可不是那种只喝加奶咖啡的穷酸俗气的可怜虫。女店主对他几乎发生好感，原因在于他也喜欢喝茴芹甜酒。“茴芹酒是世界上最好的酒：健胃、利尿、补身、生血、壮阳。”何塞先生说话向来具有确切性。两年前，那时内战刚刚结束不久，有一次他与一个小提琴手发生口角。当时人们觉得道理在小提琴手一边。但是何塞先生把罗莎夫人叫过来，对她说：“要么你把那个下贱无耻的红党撵走，要么我再也不登这个门。”于是，罗莎夫人就把那人撵出门外，此后便再无那人的音讯。那些顾客们，几乎是所有的人，起初都认为小提琴手有理，现在则开始转变看法，以至最后都说罗莎夫人干得好，应该揍他一顿，给他些教训才是。“现在如此放肆，将来会成什么样子！”说这话时他们都摆出一副严肃、公允乃至略具廉耻的神色。“不立些规矩，就没法办事，更办不成大事。”各桌上都在这样说。

一个上了年纪的汉子正在大声讲着他曾开过的一个玩笑。这件事他已经讲了快半个世纪，这是和皮门东夫人开的一个玩笑。

“这个蠢女人以为我迷上了她。对，对……她想的倒是挺美！我邀请她喝几杯白葡萄酒，出来的时候她却撞在墙上

擦破了脸。哈，哈！血一个劲儿地淌。她喊：‘啊呀呀，啊呀呀！’一边喊一边吐着唾沫跑了。可怜的女人，总是喝得醉醺醺！可是如果仔细想一下，你又会发笑！”

附近桌子上的几副脸差不多是在忌妒地看着他。他们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进入什么也不想的境界，而这时他们又会露出平和而虔诚的微笑。这种人因愚昧而好奉承，有时候尽管打心底觉得反感，甚至是不可忍耐的反感，也还是会微笑。这种奉承有时会导致杀人，由于对某人加以奉承而使好事变为犯罪的情况肯定已经不止一次。

“对待所有这类浪货都应该用这种办法。我们正经人不能允许他们放肆。我父亲早就说过！你想试试吗？那你就试试看。哈哈！那个狐狸精往后再也没去过那个地方！”

此时在桌子之间跑过一只油光发亮的肥猫，健壮而安乐，傲慢而得意。它跑到一位太太的两腿之间，这位太太吓了一大跳。

“该死的猫！滚开！”

讲故事的那个人向她投以温柔的微笑。

“不过，太太。可怜的小猫！它怎么惹您了？”

在一片嘈杂之中，一位披着长发的青年正在作诗。他潜心埋头，对周围的一切一概不闻，这是作出佳句的唯一办法。只要一看周围，就会立刻失去灵感。灵感这东西似乎象一只又瞎又聋然而又光彩夺目的蝴蝶，如果不是这样，那很多事情就不好解释了。

这位青年诗人正在作一首长诗，题为《命运》。他曾经犹豫过是否要在题目上加定冠词，但是在请教了几位比自己成

熟的诗人之后认为不必加，还是简简单单地放上一个名词即可。因为这样更质朴、更容易引起联想，也更为神秘。而且，这样起名为《命运》，具有更大的启发性，更加……怎么说呢？更加模棱而富有诗意。这样一来，很难说是指“某种命运”，“一种命运”、“莫测的命运”、“悲惨的命运”、“幸福的命运”、“蓝色的命运”或“紫色的命运”。加定冠词后约束性较大，不利于摆脱一切羁绊而自由自在地畅想。

这位青年诗人的这首长诗已经作了好几个月。他已经作了三百多句，精心设计好了将来出版的版本模式，并且拟定好可能订阅者的一份名单，到时候他将给他们寄去一份订单，说不定他们用得着。他还选好了印刷的字型（一种简单、清晰、规范的字型，这种字体看起来令人心神恬静，好了，我们要的是一种波多尼字型^①）。此外，他还确定了印刷的数量。然而还有两个问题困扰着这位青年诗人：一是在版权声明里写不写拉丁语的“光荣属于上帝”这几个字，二是扉页折边上的作者生平要不要自己写。

的确，罗莎夫人可不是平时所说的那种富于人情者流。

“我要说什么，你是知道的。论起无赖，我妹夫那一套我已经领教够了。你这个蠢货！你现在还太嫩，懂吗？太嫩。够呛！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没文化没教育的人会象一位少爷那样一边咳嗽一边跺着脚？我可不想看这个，我发誓！”

罗莎夫人嘴上的小胡子和前额上都出了汗。

“还有你，愣什么，还不快去买报纸。在这里既无尊卑

^①波多尼，1740—1813。意大利印刷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种字型叫做波多尼字型。

又无廉耻，问题就在这里！有朝一日惹急了我，非抽你们不可！”

罗莎夫人把她那双老鼠眼盯在堂倌佩佩的身上。佩佩是四十或四十五年前从蒙多涅多来的老堂倌。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罗莎夫人的两只小眼瞪得溜圆，好象一只鸟标本。

“看什么！看什么！蠢货！怎么还是跟你第一天来的时候一个样！你们这样的人，连鬼也不会来拔你们一根汗毛！快一点，麻利些，咱们就算没事。你要是敢拧，我就把你扔到街上去！听见没有？简直是乱弹琴！”

罗莎夫人摸了一下肚子，然后又恢复用“您”来称呼他。

“快一点，快一点……各尽其职嘛。您知道，做买卖不能没有眼力架儿，啧啧！也不能失礼，懂吗？也不能失礼。”

罗莎夫人抬起头，深深喘了一口气。她嘴唇上边象小胡子一样的绒毛蓬立了起来，一副神气、庄严和挑战的神态，仿佛一只发情而骄傲的蟋蟀竖起了触须。

一种笼罩人们心头的压迫感充斥着整个店堂。人们的心已经不会痛苦，而是学会了忍耐，一小时一小时地忍耐，终生忍耐下去。但谁也不晓得，也从来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位银须先生正掰着小面包蘸了加奶咖啡喂着坐在他膝上长着黑头发的孩子。这位先生叫特立尼达·加西亚·索夫里诺，是一个放债人。他的青少年时期是胡乱地混过来的，曲掘而多事；并且脾气无常。然而，他父亲一去世，他就对自己说：从今以后要谨慎行事，否则，你就会毁了自己，特立尼达。此后，他决心从商，生意越做越大，最后成了

富翁。他平生的最大愿望和幻想是当众议员。他想，从两千五百万当中选出五百人，做那五百分之一倒不错。特立尼达先生与希尔·罗夫莱斯的党内的某些三流人物勾勾搭搭，想看看能否争取到抬出他来当议员。对于他来说，在什么地方当倒没关系，他对任何地区都没有什么偏爱。他花了不少钱开宴会，搞宣传，也听了不少悦耳之言，但是到头来哪一方面都没有荐举他出来做议员，甚至都没有带他去参加过议长举行的茶话会。特立尼达先生经历了严峻的时刻，经受了精神上的危机，最后转变成了“赤色分子”。看来在激进党内混得还不错，但就在这时爆发了战争，于是他的不太成功而又为时不太长的政治生涯就此告终。正如在那难忘的一天亚历杭德罗先生所说，现在，特立尼达先生已经脱离“公共事务”，希望别人不要来干扰他，也不要对他提起过去的日子。与此同时，继续干他那放利贷的营生。

每天下午，他就带着孙子来到罗莎夫人的咖啡馆，喂这孩子午后点心。他默不作声，有时听音乐，有时看报纸，不跟任何人交往。

罗莎夫人支撑在一张桌子上微笑着。

“有什么新闻吗，埃尔维丽达？”

“您是知道的，太太，没什么。”

埃尔维拉小姐抽着烟，摇了摇头。她面容憔悴，眼皮通红，仿佛眼睛不太舒服。

“您的事了结了吗？”

“什么事？”

“就是……”